



朱光同志与周总理、邓颖超等同志合照于1955年。见《朱光传》



朱光同志(右一)陪同陈毅(右二)、陶铸(右四)、陈郁(右六)等同志迎接越南胡志明主席(右三)。前排从左至右为张茜、曾志、区梦觉同志。见《朱光传》



1955年朱光同志(右)陪林伯渠同志(左)在广州游公园。见《朱光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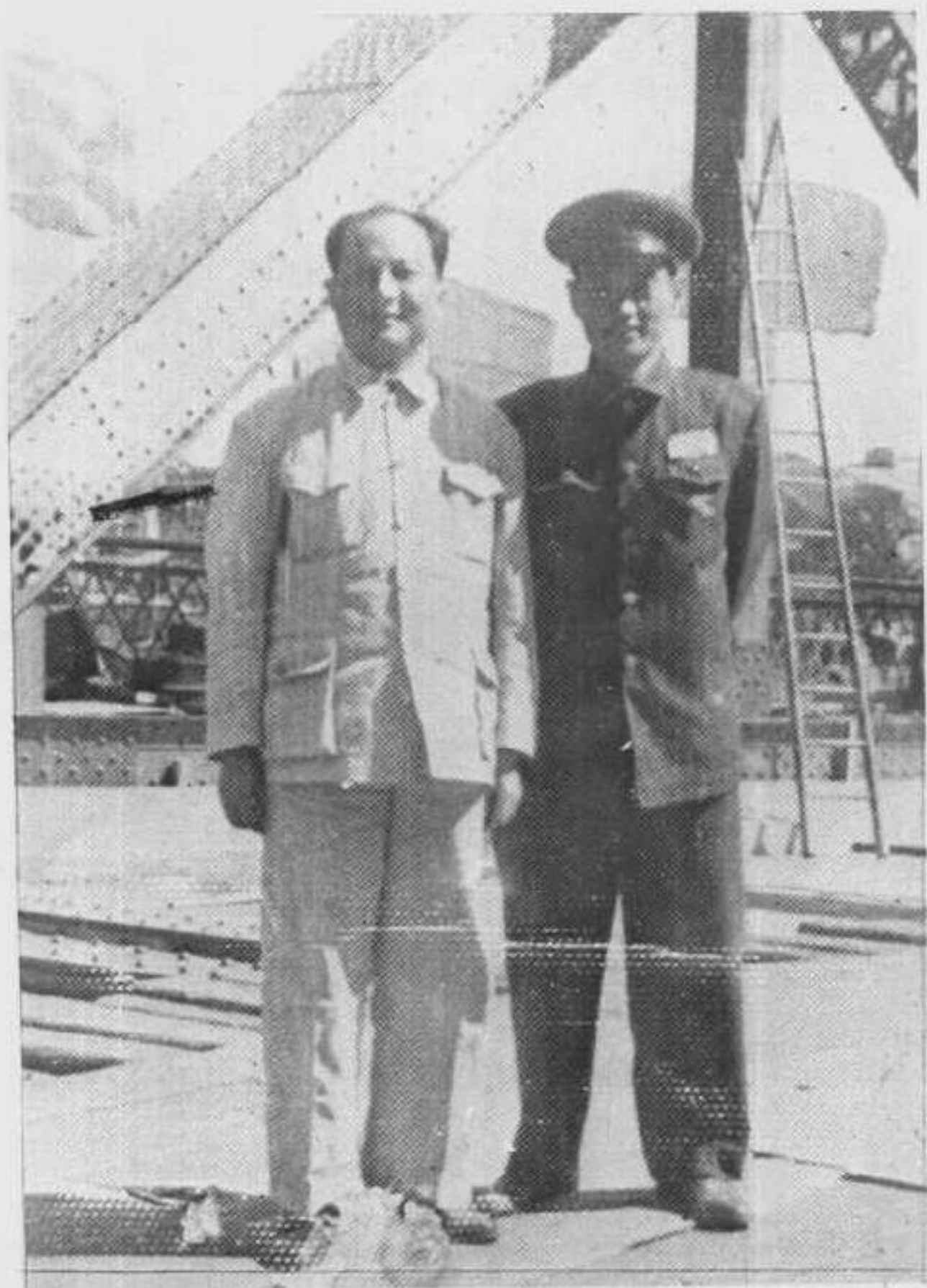
解放初期朱光(左一)与聂荣臻、陶铸、谭政、罗荣桓、徐向前等同志合摄于广州。见《朱光传》



朱光同志墨迹之一：梅。见《朱光传》

昔被蒙
 疆最乘
 風破浪
 飄流所
 南收智
 並神州
 勝當方
 白滿船
 行頭美
 魔名滅
 輝
 莫休焉
 仙
 百一中
 一九二一年
 冬
 於廣州
 朱光

朱光同志墨迹之二。见《朱光传》



↑

1975年曾生同志(左)与叶剑英元帅(右)合照。见《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

←

1950年曾生同志与朱光副市长摄于海珠桥上。见《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



← 曾生同志(左)与陶铸同志(右)合照。见《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

↓ 1964年曾生市长到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工地巡视并慰问民工。见同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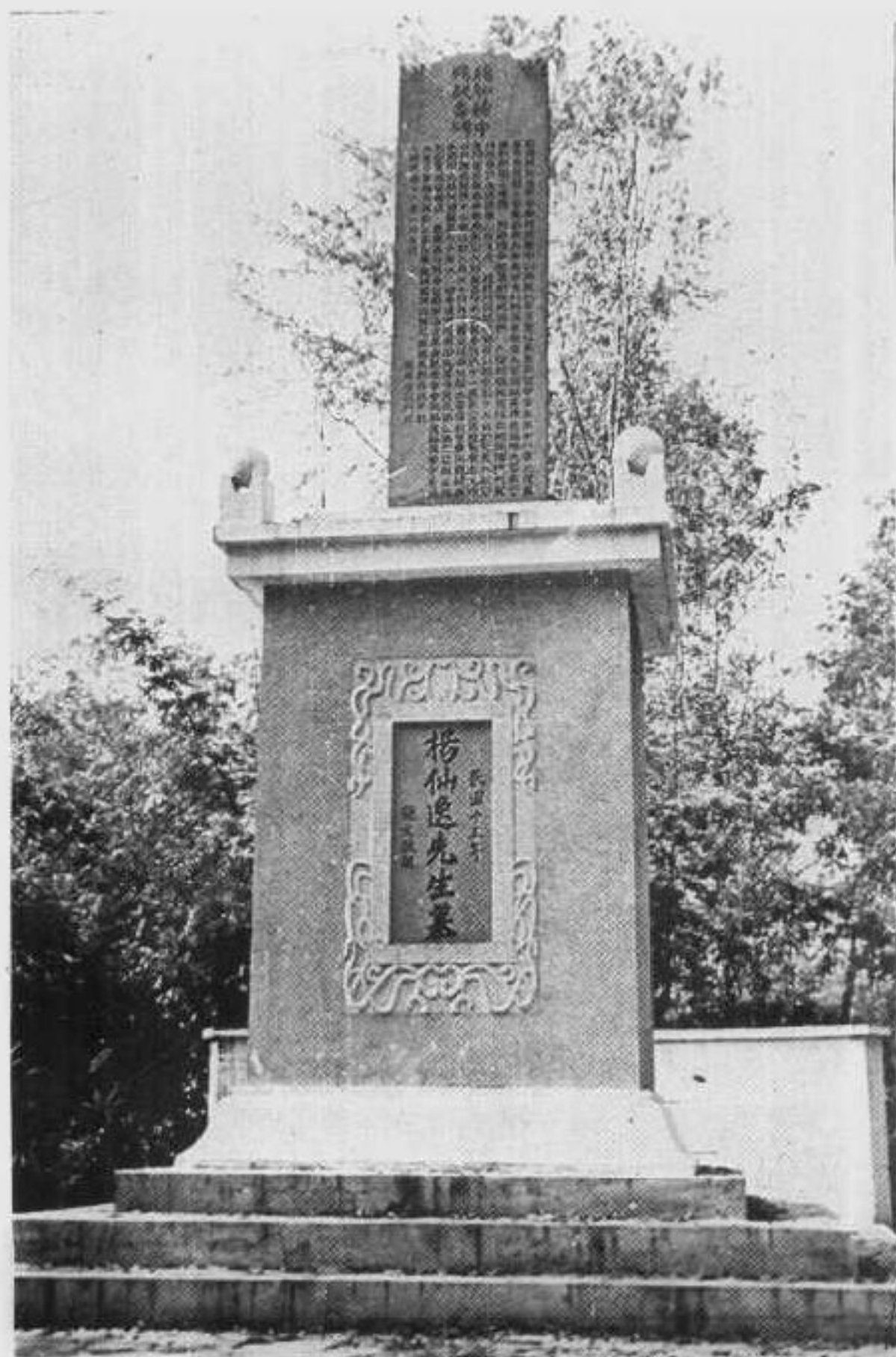
楊仙逸烈士像

楊仙逸將軍，字學華，號鐵庵。中山縣籍。夏威夷島同盟會黨員，年十八。曾先後畢業於意賀蘭小學、夏威夷大學、美洲卡利科彌省哈厘大學機械專科、茄彌時大學航空專科。民國七年，應孫中山總理命旋滬助理戎機。民國八年，入閩組織飛機隊，充總指揮。民國九年，駕機回粵討逆，炸觀音山。旋復充總統府侍從武官，羅致同志數十人，資助赴美、入航空專科學校畢業。今粵東航空人材之盛，多半由其手造。民國十一年，長航空局。親制樂士文飛機，井然成隊。民國十二年，東征。秋，九月二十日，

在博羅之梅湖檢閱水雷，不幸與謝、蘇、吳、馬四同志共殉國難，年三十有二。孫中山大元帥令追贈陸軍中將。葬於黃花崗三望崗之原。

摘自《楊中將仙逸烈士紀念碑》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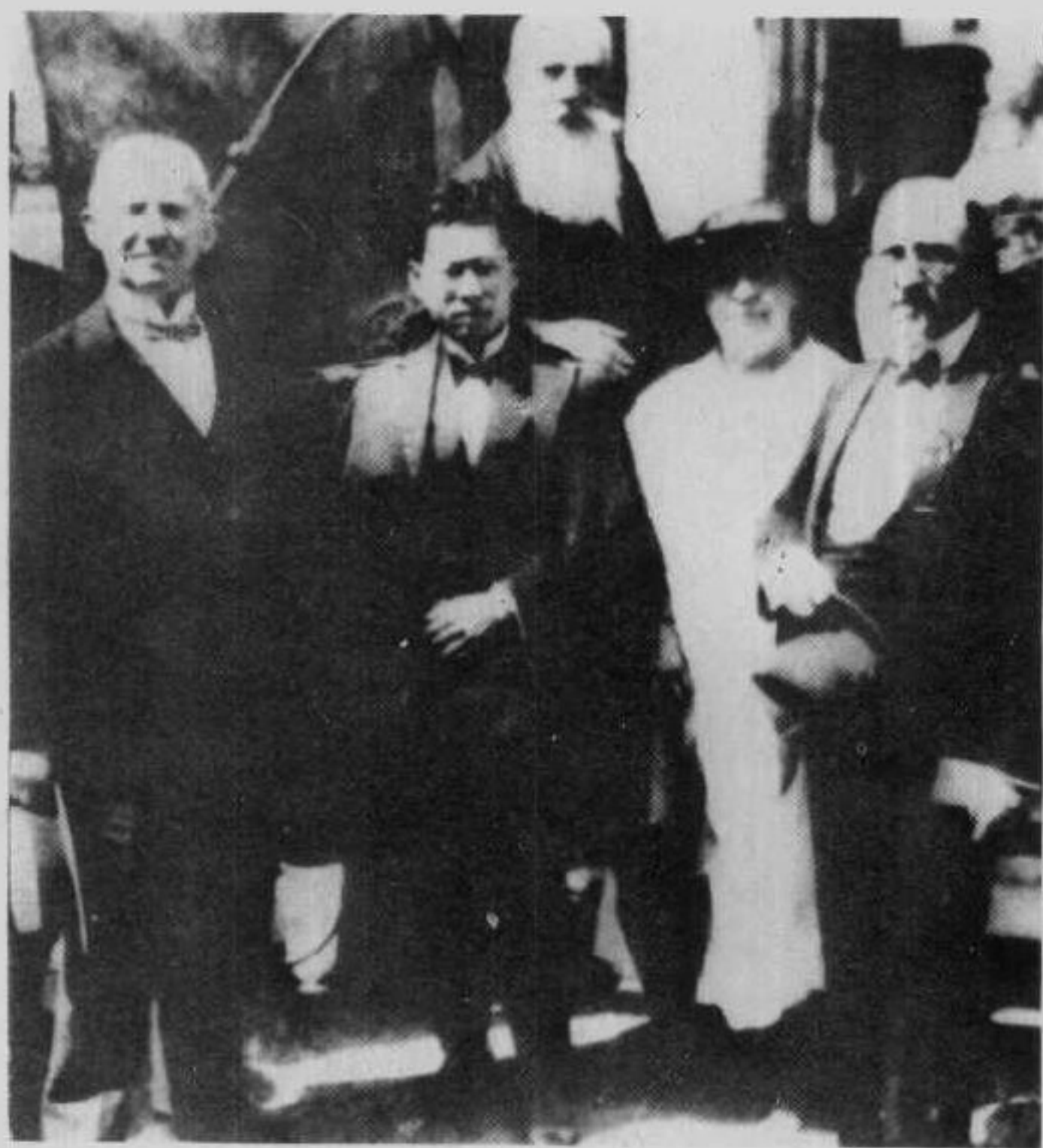
見《楊仙逸協助孫中山為航空事業奠基》



楊仙逸烈士墓



前排左三是苏从山烈士，左四是苏从山幼妹容苏凤玲。见《忆苏从山烈士》



1924年7月摄于罗马尼亚阿勒城。左起阿勒市市长、黄尊生、保加利亚世界语会长及其夫人、罗马尼亚世界语领袖菲瑟。见《我与世界语运动》

目 录

回 忆 录

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曾 生 (1)

港澳海外特稿及华侨史料

我与世界语运动……………〔香港〕黄尊生 (65)

世界语专家黄尊生教授……………李益三 (89)

陈弼臣与盘谷银行……………许肇琳 (98)

日本横滨华侨学校史料鳞爪……………卢子苓 (114)

香港学海书楼简史……………〔香港〕邓又同 (120)

杨仙逸协助孙中山为航空事业奠基

——访杨仙逸烈士哲嗣杨添儒……………王延琬 (126)

忆苏从山烈士

——访苏从山烈士之妹苏凤玲……………〔寓美〕刘锦涛 (136)

人 物 春 秋

朱光传……………胡提春 叶创昌 黄永镇 (139)

回忆丘哲先生……………罗培元 (173)

丘哲同志二三事……………梅日新 (187)

记三十年代广州美专校长李居端……………曹云峰 (190)

“问我生涯笔一枝”

- 记民间画家黄少强……………曹云峰（199）
国画家黎葛民……………邱庆镛（206）

收 复 西 沙 南 沙 亲 历

- 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纪实……………张君然（212）
收复南沙群岛……………何炳材（218）
收复西沙群岛亲历记……………韩敏学（227）

新 闻 史 话

- 老报人梁若尘……………林 铃（231）
抗战胜利后的一份短命杂志
——香港《愿望》周刊……………梁若尘（246）
抗战胜利后一张短命报纸
——《中国日报》……………梁松生口述 何季镗整理（250）
广州《天地新闻日报》被封始末……………梁元熹（253）

近代广东航空事业……………黄 严（259）

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

曾 生

困难时期肩负重任

1960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约我谈话。说朱光同志将调去中央某部门工作，推荐我接替他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便强调参加革命以来二十多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生活和工作方法也比较适应了，而地方工作自己从未做过，情况比较复杂，责任重大而又缺乏经验，怕搞不好有失党和人民的期望。陶铸同志也了解我的心情，进行耐心开导，反复讲明搞好广州市工作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鼓励我勇敢挑起这个重担。并说，广州市市长的人选问题不是他个人决定的，而是经过省委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后定的，以后还得经人大选举通过。他还说我是广东人，对全省情况比较了解，在广东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由我来当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比较合适等等。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组织观念。经过陶铸同志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己见了。于是答应先干一段时间试试看，如果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我再回到部队去。陶铸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先作借

调吧。就这样，我在广州工作期间，算是借调的干部，工资关系一直都在南海舰队，没有转出。这样做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原来说定是先借调二年的，可是，我接任后，却全力以赴地去抓工作，临时观念或打退堂鼓再回部队的思想无形中已被繁忙的任务冲掉了。

初上任的时候，正是我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真正可谓“受命于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大家的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指导和群众热情的积极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左”的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我到广州市工作的时候，这种困难局面尚未结束。1961年起为了克服困难，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的经济也进行了调整，压缩了基建和重工业。因而1961年和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60年下降36.7%和40.5%。这时，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全面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各机关团体在搞小球藻、“瓜菜代”，吃双蒸饭、甘蔗渣。不少人得了水肿病，还有数万名待业青年需要安置。见此情况，作为新上任的市长，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性的，只要党纠正了“左”的政策，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搞好广州工作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是广州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南临珠江，北倚白云山，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较高，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历来都是广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放以后，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当时帝国主义实行“禁运政策”，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广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对外往来的门户，担负着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功能。因此，广州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的重视和支持。

其次，广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从周夷王时候开始筑城算起，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是最早与海外通商和进行文化交流的港口。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有许多先进人物在这里从事斗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它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摇篮，又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一百多年前，在这里就发生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英国侵略军的鸦片战争和三元里“平英团”的斗争。花县是著名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的故乡，他那“太平天国”的理想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就是在广州孕育起来的。1911年(辛亥年)在广州发生的“三·二九”反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一大，从此以后广州便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北伐战争从这里出师，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也发生在这里。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2月11日，党又领导人民举行广州起义，在东方建立起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革命光荣传统，正激励着人们去克服困难，奋发前进。广州流传着两句名言：万般天下两件事，黄花开后又红花。这反映了广州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英雄城市，我也从

这些光荣革命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增添了信心。

第三，我对广州具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广州是我成长的摇篮。我的前任朱光市长，曾出版了一本《广州好》的诗集，他对广州的历史、人文、风貌作过具体的描写，反映出他对广州一草一木的热爱心情。我拜读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也勾引出我对广州的热爱与怀念之情。1929年至1936年，我是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然后直升大学的，我是在这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教育，并从事过激烈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现在又回到她的怀抱，真是思绪万千。正是这种对广州特殊的亲切的感情，鼓舞着我勇敢地挑起市长的重担，决心要把工作搞好。

广州人民确实不愧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人民。在我上任之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广大干部、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十分体谅我党，与党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从1961年起，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强农业战线，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动员1958年1月1日以后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新职工、干部家属、城市居民13万人回农村参加生产，减轻了对城市的负担。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八字方针的指引下，终于使我们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到1964年经济形势已全面好转，工业生产大幅度全面上升，工业总产值比1963年增长将近20%，超计划13%；产品质量普遍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农业连年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增加，购售两旺，物价下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65年、1966年工业总产值都以递增20%的速度发展。农业增产，蔬菜、副食品增多，市场日益繁荣，人民十分高兴。

我当广州市长期间，在党内是市委书记（1965年2月后为市委第三书记）。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是王德同志，他身体有病，相当一段时间由赵武成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焦林义同志任常务书记。1965年2月以后，第一书记由雍文涛同志担任，焦林义同志任第二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则改由焦林义同志担任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任过书记处书记的还有曾志、薛焰、杜祯祥、梁嘉、朱荣、薄怀奇、梁湘等同志。当时政治运动由市委亲自抓；工业生产由焦林义、梁湘同志具体抓，农业生产最初由我和胡楠卿同志抓，后来主要是由朱荣和杨毅（副市长）抓，我除了负责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以外，还与主管城市建设的林西副市长一起抓市政建设。陶铸同志很重视城市建设工作，在一次广州市委常委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把市政建设搞好了，对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并规定“广州的市政建设总的是市委挂帅，具体工作由曾生同志挂帅”（见陶铸1963年10月4日在中共广州市委68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我还分管许多工作兼了许多职务。在省里，是副省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省副主席、外事办公室主任、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委员以及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主管国防、外事和统战工作。在市里，还兼任广州军分区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对外友协会长、中苏友协会长等。还分管政法、科技、文教卫生等战线的工作。另外，又有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白云机场扩建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还以管外事副省长的身份参与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建设的领导工作等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有的同志说：“曾市长忙到头发都掉了许多”，情况确实如此。我上任时，头发长得很好，后来

竟一度成为半秃子。但聊以自慰的是，在这段时间，工作虽然很忙，心情却很愉快，工作也很有意义，与一起共事的罗培元、李广祥、焦林义、林西、杨毅、杜祯祥、梁湘、陈秋安、张瑞权、钟明、纪锦章等副市长合作得很好。特别是中央、省、市委对广州市的市政建设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支持，每年大致能有4000多万元作为城市建设的费用（包括中央、中南局、省拨的专款、工商业利润提留5%以及商品出口交易会拨给一些外汇等等）。这个数字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一笔钱拨来搞市政建设，算是很可观的了。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笔经费，在我任期内，才办成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实事。

城市建设的八件大事

经过我亲自抓的市政建设项目，有如下八件比较大的：

第一件是水上居民迁陆和改造木屋区

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据解放初期统计，水上居民有14665户，68225人。他们房无一椽，地无一寸，以小船为家，主要靠捞鱼虾和搞运输为生，白天劳动，晚上就停泊在珠江上，点上微弱的煤油灯，成为闪烁在江面上的万家渔火。他们常年过着浪里沉浮的生活，遇到刮风下雨，只好听天由命，有时船翻人亡，遭尽劫难。孩子们不能享受上学的机会。为了防止他们掉进江里，父母便在他们身上系上一条绳子，胸前背后还绑着一块浮木块。在旧社会这些处于社会最低的“疍民”或“疍家”，深受压迫和歧视。为了解除水上居民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个

问题。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归来，途经广州，专门乘船察看了黄沙、白鹅潭、沙面等沿江一带的小艇，了解水上居民的生活情况，并指示省、市负责同志一定要为水上民居兴建住宅，建设水上居民陆地聚居点和水上居民新村。1958年起开始拨出20万元在山村兴建住宅，1959年又拨出200万元在河南基立村兴建水上居民住宅，在我接任市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完成水上居民住宅建设和一系列配套工程。水上居民上岸居住，不仅要建筑住宅，还要兴建学校和商店，以及解决他们的就业、生活和教育问题。此外，还要做好思想工作。有些人习惯了泛宅浮家的生活，住在陆上反有“不自由”之感，上了岸又回去住艇了。为了尽快完成全部水上居民上陆居住的问题，1960年中央拨1200万元专款给省财政厅，到我离任前已基本上实现了基建计划。先后共建立了基立村、荔湾涌、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素社、石冲口、科甲村、山村、如意坊、马涌、东望、猎德、墩头基等15处水上居民住宅群。建成房屋使用面积共28万多平方米。这项工作，在群众中造成良好的影响，水上居民同声称赞共产党好和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说：旧政府只是向水上居民摊收苛捐杂税，根本不顾疍民的死活。只有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才真正关心“疍民”的疾苦，为我们排忧解难，上岸安居，结束了“世世水为乡，年年艇作家”的漂泊生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解决水上居民迁陆的同时，市政府还对简陋的木屋、集居的旧祠堂和书院进行了改造，以改善一部分市民的居住条件。据1958年的统计，分布在广州市各街区的木屋有24418间，面积57.7万平方米，居住着3.29万户，13.9万人。这些木屋十分低矮，多属危房。1965年和1966年，市人民政府采取“自建公助”，即资金由本人自筹一部分、亲友帮助一部分、单